

# 试论二战期间法共与戴高乐的关系

张世均

**提 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共产党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政策经历了由批评到合作的过程,为法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二战后期,由于戴高乐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限共”政策,削弱了法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实力,结束了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的军事合作,政治合作也受到限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由初期实行的批评、指责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了支持戴高乐的合作政策。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戴高乐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仇视,对法共采取“限共”政策。法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为法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地位。本文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共与戴高乐的关系作一探讨,以阐明法共对戴高乐政策的变化和戴高乐对法共的态度,说明产生这种演变的实质,总结法共应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共由于受到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法共发表宣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的战争,因而不支持法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使法共党员陷入了思想混乱和策略错误的困境中。法国政府鉴于法共对二战性质的认识和态度,1939年9月26日宣布法共为非法组织,禁止法共公开活动,法共党员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40年6月,法国政府败降,贝当在法国南部维希组成傀儡政权,原法国陆军部次长夏尔·戴高乐流亡英国伦敦,组织了“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在海外树起了反对法西斯的大旗<sup>[1]</sup>。但此时的法共虽然明确反对投降卖国的贝当政府,却对德国占领当局态度暧昧,甚至被迫打入地下的法共某些领导人仍然对德国充满幻想,企图通过德国占领当局来恢复法共的合法地位。1940年6月下旬,法共秘密机关曾经两次派遣代表同德国军事当局谈判,就法共机关刊物《人道报》的合法复刊问题进行交涉。7月,地下《人道报》的主编写信给德国占领当局,请求允许《人道报》合法出版。他写道:“我们出版《人道报》决定把谴责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活动作为它的任务……我们出版《人道报》决定把采取欧洲媾和政策和支法苏友好条约作为它的任务,它将是苏德条约的补充,从而创造了持久和平的条件。”<sup>[2]</sup>1940年7月10日,法共中央以多列

士和杜克洛两人的名义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谴责贝当和“那些企图把法国绑在英帝国主义战车上的人”，并没有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参加抵抗运动，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法共的一些出版物强调说：“法国不是英国的自治领，也不是德国的保护国。”法国人民“既不愿充当英国的炮灰，也不愿充当德国的炮灰；既不愿为丘吉尔卖命，也不愿为希特勒卖命。”<sup>[3]</sup>直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前，法共依然指责戴高乐是：“伦敦银行家的走狗”，不时加以严厉的抨击。

很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是反法西斯主要力量的法共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一度放弃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正义行动，甚至幻想同德国占领当局合作，取得合法地位。对于在海外组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法共采取了错误的批评、指责行动，认为戴高乐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企图把法国绑在英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是“伦敦银行家的走狗”。法共对戴高乐的态度搞乱了法共党员的思想，使法国在战败初期的抵抗运动没有很好地团结起来，影响了全法国抵抗运动的健康发展，削弱了法国抵抗运动的力量，给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 二

随着法西斯德国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德国与占领当局不断地破坏法共组织，逮捕法共领导人和法共党员。法共一些领导人企图同德国占领当局进行谈判，恢复法共合法地位的幻想破灭了。1940年12月，法共出版了《共产党二十年》纪念集，明确指责“柏林的主子们”，标志着法共在方针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共产国际在1941年1月发出新的指示，建议法共放弃对戴高乐的批评，并指示必须估计到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客观积极作用。<sup>[4]</sup>从此，法共开始改变对戴高乐的态度，加强了同“自由法国”情报组织的联系，加强对工人抵抗斗争的领导。

1941年5月15日，法共中央为了团结各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共同抗战，发起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并声明：“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解放阵线，党愿意支持任何法国政府、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只要他们努力进行有效的斗争来使法国摆脱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反对为侵略者效劳的卖国贼而真诚地进行斗争。”<sup>[5]</sup>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法共虽然改变了对戴高乐的态度，但同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并无直接的联系。1942年2月，“自由法国”在法国本土的“圣母会”情报网领导人雷米同法共取得了联系。法共领导人捎口信给戴高乐，表示愿意与“自由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直到最后的胜利，但以保持现有的行动自由为条件”<sup>[6]</sup>。1942年5月，法共领导的抵抗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代表与戴高乐的代表勒米上校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同年8月，法共政治局委员马尔蒂在莫斯科会见了“自由法国”的代表加罗，表示愿意接受戴高乐的领导。1942年11月25日，法共代表和戴高乐的代表在法国会晤，就法共和“战斗法国”（1942年，“自由法国”改称此名）紧密合作的共同行动纲领达成了协议。<sup>[7]</sup>协议规定：法国国内“民族起义”归法共领导，国外抵抗运动由戴高乐领导。为了表示对法共与戴高乐合作的祝贺，法共还将一盆杜鹃花送往伦敦献给戴高乐夫人，但戴高乐只接受了杜鹃花，却否定了协议文本，要求把法共纳入“战斗法国”的轨道归其指挥。

1943年1月8日，法共中央委派前议员费·格列尼埃作为第一个法共代表到达英国伦敦，作为驻“战斗法国”代表同戴高乐保持经常性联系。费·格列尼埃在1月21日对英国伦敦《工人日报》的谈话中公开表明了法共的态度：“我们认为，戴高乐是第一个抵抗战士，目前抵抗运

动的最高领导权似乎应该归属于他。”并表示法共领导的抵抗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愿意接受戴高乐的指挥。2月10日，戴高乐在给法共的回信中指出：“费尔内·格列尼埃的到来，共产党参加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他以你们的名义通知了我），你们让我作为法国武装力量的司令来调遣你们组织并鼓动起来的游击队，这是你们为我国的解放和强盛作贡献的愿望的新标志。我相信，你们的决定给民族带来了一大贡献，我谨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你党党员已同意为法兰西效劳贡献一切以后，人们将要求你们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sup>[8]</sup>不久，费·格列尼埃被任命为民族委员会的内务和劳动委员会的代表。

1943年2月21日，戴高乐要前罗亚尔省长让·穆兰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5月27日，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第六区召开成立大会，让·穆兰当选为主席，并选出一个由7人组成的常委会，协调各抵抗组织的力量。让·穆兰牺牲以后，由皮杜尔接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在全国抵抗运动领导下，法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地方抵抗委员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9月成立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其主席是巴黎总工会总书记、共产党员安德烈·托莱。

1944年是欧洲反法西斯斗争大决战的一年。这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全部苏联领土，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推动了欧洲各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英美实现“霸王”战役的行动。1944年2月1日，法国所有抵抗组织的武装力量联合成了法国“内地军”，法共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成为了法国“内地军”的主力队伍。4月，戴高乐在英国伦敦成立了法国“内地军司令部”，任命柯尼希为“内地军”司令。这样，戴高乐在政治上、军事上统一了国内抵抗运动，并成为各抵抗组织一致公认的领袖，为法国解放后掌握全法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6月6日，戴高乐即号召法国人民投入解放祖国的战斗，“对于法兰西的女儿们来说，无论他们在哪里，也无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的神圣职责是用一切方法打击敌人”。<sup>[9]</sup>同时，法共中央也发表声明，号召法国人民“与盟军一起，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为恢复法国的自由、独立和伟大的权利而斗争”。到1944年夏，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迅速发展到了50万人，其中法共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则由2.5万人猛增到25万人<sup>[10]</sup>，他们积极响应民族起义的号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配合盟军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7月1日，法共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第一次公开带着武器举行示威游行。7月14日，巴黎地区人民举行了法西斯德国占领四年来的第一次国庆游行，参加者达15万人。8月7日，巴黎内地军司令、共产党员罗尔上校发布命令，动员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开展军事行动。8月23~24日，法国“内地军”和“爱国民警”成功地阻止了德国军队的后撤。25日下午3时，勒克莱尔和罗尔接受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傍晚，戴高乐随勒克莱尔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入巴黎。巴黎的解放是戴高乐与法共军事合作的结晶，有力地配合了英美盟军的军事行动，加速了全法国的解放。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到1944年8月巴黎解放的这一段时期里，法共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策略，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性质有了客观、正确的认识。在法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法共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实行了积极合作的政策，团结了国内的抵抗组织，并承认戴高乐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特别是194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后，以法共为主力的内地军积极配合盟军、“战斗法国”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为巴黎以及全法国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三

1944年8月,巴黎解放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进行,德国法西斯失败已成定局。全法国解放以后,法国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逐渐让位于阶级矛盾,是由戴高乐还是法共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又突出了。戴高乐对法共也由合作逐渐转向“限共”政策,为戴高乐夺取全国政权奠定基础。

在法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抵抗运动使法共进入了舆论“公认的大党行列”。由于法共在国内坚持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积极与戴高乐进行合作,不仅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而且拥有为数可观的武装力量,这就导致了戴高乐的不满。戴高乐把法共作为其建立全国政权的主要障碍,因而在争取法共合作支持的同时,又实行所谓的“限共”政策,削弱法共在法国的力量 and 影响,从而达到阻止法共在战后掌握法国政权的目的。

早在1943年1月,法共中央委员会委派费·格列尼埃为驻“战斗法国”的代表时,戴高乐在英国伦敦第一次会见费·格列尼埃时就问:“法国解放后会发生什么事?”“你认为法国那时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吗?”可见,戴高乐在二战时期与法共实行合作,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对抵抗运动的控制,同法共争夺领导权,而且其着眼点不光是在当时的斗争中加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法国解放后执掌整个法国政权。

194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后,法国国内抵抗组织进一步活跃。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争得了巴黎的光复,而巴黎的解放使戴高乐同以法共为主力的人民抵抗运动力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上升。在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下属军事行动委员会的三个委员里有两个是法共党员,巴黎起义委员会的主席是法共党员罗尔上校。戴高乐此时担心:“首都起义后,可能有些人要建立由第三国际操纵的政权”。如果法共“能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并能指挥巴黎的军队,他们就很可能建立一个由他们实际领导的政府……最后建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sup>[11]</sup>巴黎人民起义的迅速发展,使戴高乐坐立不安,日夜“害怕由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分子领导、掌握政权”<sup>[12]</sup>,因而“戴高乐担心抵抗运动中的某些政治人物为取得政权而制定的计划在我看来则是比较有希望的。我知道这些人想利用群众激昂的情绪或首都的斗争所形成的无政府状态,在我没有抓住操纵杆以前抓住它。这当然是共产党的意图。等我返回首都的时候,这个‘人民’政权已经大权在握”。<sup>[13]</sup>为此,戴高乐急忙请求英美盟军迅速占领巴黎,以防止共产党掌握政权。<sup>[14]</sup>8月25日,当勒克莱尔把德军投降书的副本递给戴高乐时,戴高乐看到副本上面有巴黎内地军司令、法共党员罗尔上校极力要求加上的一段话:罗尔与勒克莱尔同样有权接受德军司令部的投降,而且签署投降书的名次排列竟然是罗尔、勒克莱尔、冯·肖尔蒂茨(德国代表)时,即训斥勒克莱尔这样做是助长了法国共产党夺权的野心。<sup>[15]</sup>

巴黎解放以后,戴高乐打着“国家复兴”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旗号,表示要趁热打铁,及早下手,“排除一切与我平行的权力”<sup>[16]</sup>,要求盟国在法国获得解放后,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唯一合法的政府,认为要防止解放后的法国“发生纠葛以至内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以他本人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随着德国人的撤退,立即接管政府”<sup>[17]</sup>,企图独吞法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果实,从政治、军事上全面瓦解法共在抵抗组织中所起的核心作用。8月28日,戴高乐向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宣布:“巴黎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理应列入解放事业的光荣史册,但再也没有理由作为一个行政机构继续存在了,因为政府将负起全部责任。”<sup>[18]</sup>戴高乐还宣布,除了正规军以外,任何武装部队都没有理由继

续存在。当天，戴高乐决定解散“巴黎现有内地军的指挥部上层组织和参谋部机构”，分别由巴黎卫戍司令和各有关军区司令执行它们的职权。9月19日，戴高乐又发布关于整编“内地军”的法令，命令“内地军”和正规军合并，服从陆军部长指挥。“内地军”被正规军合并后，戴高乐又把法共领导的“爱国民警队”看成他掌握法国大权的一大威胁，“感觉到他们正准备随时向政府施加压力，企图控制政府或者夺取政权”。10月28日，戴高乐下令除军队和警察以外的一切武装应立即解散，先后又有“爱国民警队”、全国抵抗委员会、巴黎解放委员会被迫解散。戴高乐通过上述行动从而解除了法国共产党所控制的所有武装力量，结束了与法共进行的军事合作，达到了“限共”目的，为战后在全法国建立以戴高乐为首的资产阶级统治扫清了障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特别是法国首都巴黎获得解放以后，法国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成了阶级矛盾，戴高乐为了在全法国建立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曾经给予积极合作，为法国的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的法共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进而解除了法共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削弱了法共的力量和影响，为战后在法国建立其统治消除了心腹大患，奠定了执掌全国政权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共与戴高乐的关系随着法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演变。法国败降初，法共由于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而对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持批评、指责的态度，给法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苏德战争爆发后，法共放弃了对戴高乐的批评，承认了戴高乐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同戴高乐进行了积极友好的合作，为法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作战和巴黎的解放，戴高乐为了防止法共掌握政权，对曾给予其重大帮助和支持的法共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政策，解除了法共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削弱了法共的地位和影响，为其战后在全法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奠定了基础。

## 注 释

- [1] 见拙文：《试论二战期间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载《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 [2][15]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05页、第373页。
- [3][6][11][13] 周剑卿、张锡昌：《传奇人物戴高乐》，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第48页、第67页、第68页。
- [4] 沈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2页。
- [5] 王礼训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 [7]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补遗本，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 [8][16]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二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577页、第582页。
- [9] 肖石忠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传》，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 [10] 卢文璞主编：《世界现代史，1914—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 [12] 弗朗索瓦·凯尔索迪：《巨人之情——戴高乐和丘吉尔》，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 [14] 多米尼克·弗雷米：《法国历届总统小史》，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285页。
- [17]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1页。
- [18] 让·拉古都尔：《戴高乐全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